

刘梦溪：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

本报记者 杨晓华 文/图

一、价值缺失和价值认同

记者：上次与先生在中华文化促进会举办的“两岸人文对话”论坛的短晤中，您提及近几年来一直关注文化价值的缺失与重建的问题，您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在价值方面的缺失的？

刘梦溪：我所谓的价值缺失，应该指的是两个方面的缺失，一个是传统价值的缺失，至少可以概括为敬、恕、和、耻这些基本价值的缺失。“五四”以后废除“读经”，我们最高的经典被废弃了，这些基本价值也失去了承载的凭借，这是很大的损失。另外一个现代文明的理念、秩序、方法也严重缺失。看当代中国文化，只看到一个缺失就容易走偏。譬如在当下社会，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被关注的背景下，一窝蜂地回到传统这里来，几乎到了有我无他的地步，这怎么可以？还是得看到整个世界。所以我在讲文化问题的时候，多次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”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。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有好的方面，文化的结晶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，现代文明的理念、秩序、方法也是我们亟需弥补的基本价值。

二、“敬”体现人的“自性的庄严”

记者：就传统价值的缺失而言，您提到了“敬、恕、和、耻”，提到了“诚、敬、信”，其中关于“敬”，阐述尤多，并认为这种“敬”是一种“自性的庄严”，您理解的这种“敬”具有典籍上的依据，还是自己的独到理解？

刘梦溪：文本在那里。《论语》中对“敬”的论述是完整的。子游问孝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今之学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没有敬，人的所谓孝和犬马就没有区别了。《论语》中凡是讲“礼”的时候，核心皆在敬。孔子说：“为礼不敬”，“吾何以观之哉？”所谓“无敬不成礼”。到了宋儒那里，周、程、张、朱四大家，不约而同地提出了“主敬”的概念。再往后对此关注比较少。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先生重新关注此义，这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桥梁。但是马先生没有像我这样提撕得这样高，把“敬”放到信仰的维度，进入终极价值的层面，是我没有做到的。

“敬”不只是一种敬意和尊敬，更主要更根本的是指人的“自性的庄严”，是合乎人类本性的一种庄严虔诚，是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性。孔子讲：“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“志”是什么？马一浮认为“敬”就是人的“志”。所以，我认为“敬”已经进入到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，是一种庄严虔诚的精神境界，是不可夺、不可易、不可变的至纯至洁。当代社会最缺少的就是这种人的“自性的庄严”。所谓价值的重构，主要是文化的精神信仰的重构。不是靠靠细的工夫，更不应该以小智、私智计较个人得失，而是靠对中国文化大智慧的“证悟”，来建构起庄严起信的自我精神世界。我新出的《大师与传统》增订本，其中一篇讲大智慧需要“证得”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三、“敬”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

记者：为什么要使用“信仰”这个词呢？为什么要放到这样的维度上去讲“自性的庄严”呢？

刘梦溪：研究文化离不开信仰。信仰需要有终极关怀，这是信仰的标志。信仰不同于崇拜，崇拜是对对象世界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倾服，但是信仰则是终极的皈依。中国人并不信仰天，而是崇拜天。上天浩渺无际，充满未知，因此使人产生敬畏。中国人也崇拜祖宗，慎终追远，明其来路。所以祭祖和拜天是传统社会两项最大的礼仪。信仰是精神世界的终极指向，是永恒的归宿。不是到了哪一点会停止，而是不可穷尽的永恒的旨归和皈依，没有终点，没有尽头。如果信仰存在哪方面的缺失，就需要重新建构起来。

中国人有信仰吗？我们有佛教、道教。东汉就开始了。但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，后来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，礼佛拜佛是为了使自己得到现世的报偿。道教是本土宗教，带有泛自然化的倾向。佛和道的信仰坚固性未免受到质疑。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儒家，其立义宗旨是否有信仰的价值层面？有人说儒家就是宗教，我不认同这种说法。儒家不是宗教，陈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了。但是儒家话语下有些东西进入了信仰层面，比如“敬”。孔子讲：“祭神如神在。”为什么讲此话？“神”的有无、存在不存在，孔子未做探讨。但在祭神的时候，他要你相信“神”是存在的。如果祭祀时你对“神”有所置疑，你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虔诚之心。这里他强调的是自我精神的“敬”，而不是祭祀对象究竟如何。对超自然的事物，孔子很少发言。所以他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以及“敬鬼神而远之”“不怪语、力、乱、神”等。但是他认为对祭祀对象的“敬”，是无可异议的，对“敬”的精神价值的尊崇，达到一种绝对的程度。

“敬”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，是发自内心的庄严，是不可动摇的具有终极指向的价值，具有信仰的特征。为了守持这种精神价值，可以不妥协，可以献身。儒家话语下的信仰的力量在此，在自性的力量，问题纠结通过自身、此岸来解决，不必登临彼岸。如果你建构起自性的庄严，如果你有所“敬”，就不会胡作非为，不是由于怕鬼神才有所畏惧，而是你本身有这种自性的自觉，这比怕鬼神才收敛的境界高多了。

四、由文史的学问转变

记者：您早年是从事文学研究的，后来又进入思想文化的研究。对文化价值缺失问题的关注和



刘梦溪先生近影

您的学术路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？

刘梦溪：我念文学出身，曾长时间关注文学。一个时期对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有相当的关注，但持续关注的还是古典文学。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、陶渊明、杜甫、明清文学，我都做过研究，付出过很大的努力，成果收获较多的是《红楼梦》研究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大转变，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，可以说是“尽弃文学”。

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当时转变的契机和桥梁，是20世纪的3位大师级人物：王国维、陈寅恪和钱锺书。那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心无旁骛以全副精力研究他们的著作。这种阅读，使得我不再看重文学研究，甚至对当代文学能否成为学问的对象产生了疑问。结果是我完成了一个学术工程，就是把20世纪大师级人物的人文学术著作重新加以整理，最后出版了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丛书。这套书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一直到1996年，邀请一批学界友人一起来做，历经7年艰辛。丛书收录著名学者45家，30多卷，2000多万字。这应该是后来的民国学术热最开始的一个努力。当然，学术上很难讲谁是第一，但重点关注20世纪的现代学术，我是比较早的。

20世纪这些大师，不仅是连接古今的桥梁，也是连接中西的桥梁。因为他们为学术的特点，既通古今，又贯中西。所以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，尽管是编纂，但牢牢建立在我个人文本阅读的基础上。这部书的编纂使我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有了整体了解，打开了20世纪学术谱系的大门，对我个人的学术积累十分重要。我为此书写的6万字的总序，以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为题，三联书店出版时扩为10多万字，共12章，前四章讲的都是中国传统学术，其实是一部学术思想史的专著，思想充溢跳荡，其中有很多我的新见解。

五、陈寅恪研究

记者：您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，对陈寅恪先生似乎情有独钟，您认为通晓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，“在中国现代学术中，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，把为学术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述？

刘梦溪：我以20世纪的学术史为底色，开启自己学术研究的新阶段，主要是对20世纪学术的几个重要的点和个案，进行纵深研究，一个是王国维，一个是陈寅恪，还有一个是马一浮。下功夫最大，倾注时间最长的是陈寅恪。对陈先生的著作，每一篇、每一个字我都仔细读过。陈寅恪的学问深，长期浸润，我的学问也深了一层。所谓“出文入史”，我是借助陈先生转入的。有关陈寅恪的研究，我发表了近30万字的文章。本来是一个系统的专著设计，但是这部书我还没有最后定稿。我并不急于出版，学术问题不是抢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思想、有没有深度的问题。陈寅恪是大学者，也是大思想家。去年我把研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的专题整理出十七八万字，单独出版了，即《陈宝箴和湖南新政》。过一个时期，再完成规模大点的专著。

记者：会在今年之内出版吗？

刘梦溪：不一定，我不想设定明确的时间。没有早些完成，还有一个原因：我的学术兴趣中间发生了转移，我喜欢上了马一浮。本来是研究王、陈、钱，一旦进入马，其他就暂且推后了。马一浮在20世纪大师中，是学问最好的一位。史学和考据学方面，马一浮前面自当有人，但义理学，对中国思想义理的分疏方面，我看不出有谁能超过他。马一浮读书多、思想深，本我完整而又超越性精神。我在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中讲，陈寅恪是站在地上，带着深沉的家国天下的兴亡之感，关注故国与文化的未来，而马一浮则站在云端，以自足而又超越的理念俯视众生。

六、跟随马一浮由宋学返归“六经”

记者：马一浮先生被周恩来誉为“当代理学大师”，被学界誉为儒学“现代三圣”之一。他精于书法，合章草、汉隶于一体，自成一家，丰子恺推崇其为“中国书法界之泰斗”。

刘梦溪：是的，马一浮的书法一如其人，有圣者气象。读通马一浮，有两个学脉必须了解，一个是儒学，一个是佛学。儒学的学脉直接和宋代相连接。中国的学术思想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

家之学，到两汉经学，到魏晋南北朝的玄学，到隋唐的佛学，再到宋代的理学，宋代的学术呈现思想的大汇流，儒家、佛家和道家的汇流。朱熹是集大成者，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，各有千秋，他们把儒学带进一个新天地，和先秦、两汉的儒学不同了，已经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。但他们本人不承认，文章、言语经常辟佛。马一浮的学问直承宋学，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不赞成宋儒既吸收佛教又批评佛教的做法，他认为，不懂佛学，不会真懂儒学，佛学和儒学是马一浮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。你要问他是儒家还是佛学家，我说他是兼得兼通，很难讲哪个更重要。他的佛学造诣，20世纪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。

我被马先生的学问迷住了。所以，一段时间我跟着他往佛学方面走。好在编纂20世纪学术经典的时候，对现代佛学的几大家，杨文会、欧阳竟无、太虚、吕澂等，有过深厚的兴趣，曾遍读其书，对进入马一浮的佛学，颇有帮助。接着又跟着马进入宋代，用近两年的时间通读宋四家的著作。然后写了关于朱熹、关于张载、关于宋学的整体建构的文章。马一浮没研究完，我又研究起宋学来了。而宋儒直接所继承的，是孔孟儒家思想，是对“六经”的重新解说。于是我又追随宋儒的足迹，走进中国思想的的源头“六经”。现在还在“六经”和孔孟里打转，不仅陈寅恪放在一边，马一浮专书的写作也靠后了。

记者：看来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知识和机理的转变过程，而是一个现代学人在当代境遇中，对学术流脉的重新触摸和中国古典思想的重新照亮。

刘梦溪：谢谢。假如我在研究中有点特点，那就是我在喜欢古典的同时，还喜欢思想，重视思想。我喜欢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思考的。在这个探索和建构的过程中，我充满了忧患意识，这是我了解传统理念的一个动力。我希望摸索到一些东西，可以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，一个角度，或至少是一个方法。

在由马人宋再返回“六经”的过程中，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。我认识到了，或者理解到了，中国所有思想的源头都在“六经”。这个话是马一浮讲的，他说“六经”能够“统摄一切学术”。熊十力也讲过这样的话。他们都讲“六经”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。“六经”为什么如此重要？中国的学问是义理、考据、辞章并立，考据是学问工夫，辞章是表达方式，义理是作为学术思想的部分，是学问的灵髓。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，是一个文明体国家最精彩的部分。中国的这些思想结晶，集中在“六经”，就是经过孔子修订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失传了，不能得其全，剩下“五经”。但学者习惯还是称为“六经”，王夫之的名言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熊十力的一本书就叫《论六经》。

那么，“六经”的思想义理都是什么呢？“六经”的基本思想义理是诚、敬、信，或者反过来，是敬、诚、信。《易经》坤卦的《文言》说：“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”《礼记》说：“诚信之谓立，尽之谓敬，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。”又说：“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，生民之本尽矣，死生之义备矣。”这是多么重要的思想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讲的义理，就是“六经”的基本义理，讲述“敬”义就更多了。我近年的文章和书，做过大量举证。而当代社会最缺的价值理念是什么？当然是敬、诚、信。因此“六经”讲述的基本义理对今天是否有用，已不成其为问题。而且不是一般的有用，而是对当代精神建构有根本大用。那我就觉得，“五四”以来废除读经，是好大的一个损失，中国最根本的思想长期被隔断了。

七、重新梳理国学定义

记者：近年来，您对国学、对国民教育多所关注，甚至作了直言不讳的批评。我明白，您是希望通过国学教育，把一整套价值理念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去。对国学，您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理解。

刘梦溪：是的，现在很多人都讲国学就是中国整个的传统文化，内涵扩大到无边无际。其实最早胡适给国学下定义的时候，也还稍有边界。1922年北大建立国学门，次年出版一本刊物叫《国学季刊》，请胡适之先生写的发刊词。胡先生说，什么是国学？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。什么

是国故呢？就是中国的文化、历史、制度、语言，所有这些过去的东西都是国故。“国故”这个词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，章1910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《国故论衡》。但“国故”这个词，40年代以后很少有人再用。后来学术界一致的看法，认为国学应该指中国固有学术，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的理学、明的心学、清中叶的朴学等。如果这个定义成立，国学就是学术史。如果国学是学术史，跟一般民众就不发生关系。不仅跟一般民众没有关系，和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，也没有太大关系。可是大家都这么看，现在也如是。

其实马一浮先生早在1938年就重新厘定了国学的定义。他当时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，提出“国学者，即是六艺之学”。“六艺”就是“六经”。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使我如醍醐灌顶，因为我正在由宋学追溯到“六经”的时候，所以一下子就贯通起来。由此我认定，国学就是“六艺之学”，是关于“六经”的系统学问。但我提出还要加上小学，即文字、训诂、音韵的学问，这是进入经学的台阶。经学和小学，是国学的两根支柱。这是中国人文学术最高的学问，是学术的经典学问。

记者：宋儒陆九渊说：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”，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传承中，“六经”长期保持着经典的地位，后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中，“六经”是如何被搁置起来的？

刘梦溪：中国近现代以来，学术衍变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重视学术分科，“文学的归文学，史学的归史学，哲学的归哲学”，这是胡适的话，他认为“整理国故”的第一步，是要分门别类，大学的人文学术需要分科。分科没有什么不好，问题是“六经”被搁在一边了。“六经”是最高经典学问，并不是文史哲的综合。有大学很想在国学院设立国学博士，我很反对。“国学博士”是研究什么的？如果你写论文写的是王阳明，哲学系的学生也写王阳明，为什么他得哲学博士，你得国学博士？如果你写的是杜甫，文学系的学生也写杜甫，为什么他得文学博士，你得国学博士？化解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如果确立国学主要研究经学和小学，国学院就可以把国学和文史哲三科区别开来了。所以我就主张，国学院应该设经学部、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。

八、国学和国民教育

记者：我注意到，您主张通过国学教育的途径来赓续传统，让“六经”的义理濡染人心。那么国学教育到底如何实施，方为比较理想的方式呢？

刘梦溪：“六经”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，马一浮先生说得对，“六经”的义理是和每个人的心性相通的，通过学习、涵咏，就是施以“六艺之教”，使“六艺之道”和每个人的心性、经验、体悟联系起来，化作每个人自己的思想，就可以使每个人变成一个理性自觉的人。使受教育者既成为一个现代人，同时又是“六艺之人”，应该是现代教育追寻的理想。

把国学的要内涵视为“六经”，就可以和一般民众发生关联，就可以跟国民教育结合起来。所以我主张在小学，中学，大学的一、二年级开设国学课，以“六经”的选读为主要教材。“六经”的文本当然很难读，信屈整牙，怎么办？先从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开始。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“六经”的义理。我称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是“六经”的通俗读本，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入手，就化难为易了。开始我主张在小学设国学课，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看了我的书，说你提出了重大的问题，你这个想法是试图在现代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。但是他说，何必只是小学？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。我接受了金先生的建议，此后的文章便主张小学，中学，大学一、二年级都应该开国学课。小学以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为主，中学可以加入“六经”的选读，高中和大学一、二年级，还应加上文言文写作练习。

这样的设想可以重建中国教育的“传道”的内容，中国传统教育历来把“传道”放在第一位，是历史和哲思的重要补充。文学的根底使我对学术研究更富有想象力，也使我更有还算不错的文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中国学术背景下，文、史是合一的，义理、考据、辞章是学问的互成结构，文学就是辞章，文学也离不开义理。中国古代的文学家，本身就是文史合一的，很少有绝对的单纯的文学家。

李泽厚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他主张“情本体”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主张，而且我的人格现实是和“情本体”合一的。理性的东西不容易给你以幸福感，它使你头脑澄明，但是真正的幸福感在情，烦恼也在情。我是很性情的人（我讲的是底子），个体生命有一种天生的自由感，不喜欢拘束，不执于一端。我推崇“六经”，并不意味着我是儒家的信徒。所有的思想，都是我的资源。老庄的思想也很了不起，我也喜欢，但我不是道家。佛教我更喜欢，每临寺庙，都有大欢喜，但我不是佛教徒，情未了，俗未断。我为学不专主一家，喜欢百家。

记者：您讲的“自性的庄严”和新儒家讲的“内圣外王”有没有学理上的联系？

刘梦溪：我没有采用新儒家的论述。“内圣外王”是新儒家的论述。我讲的“自性的庄严”，是每一个人本有的，与生俱来的，并不是要做“圣”，而是要做人。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品格，应该具备的信仰。人的自性长期没浸，蒙尘已久，没有被点醒。用什么点醒？用“六经”，用“六经”的义理把人的自性提撕起来，启悟开导，达到自性的理性自觉。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？不一定。陈寅恪研究佛道，但并不信仰佛道，但他显然是保持“自性庄严”的典范。我在京原来的住所，和我对门是一位老工人，来自农家，他的内人是来自农家的不识一字的家庭妇女，比邻多年，我这边进出的客人多一些，门开时，从未见他们往我们房间里看过一眼。但遇到我们不在家，稍有动静，他们会立即出来问明情况。这是普通人的“自性庄严”。我们的文化中原本就有此义，只不过是后来丢失了而已。

所以，我关注的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问题，包括国家与社会的精神建构问题，也

就是马一浮、熊十力讲的立国和做人的根本依据问题。

九、中外价值理念的互阐

记者：您讲到“敬”，讲到“自性的庄严”的时候，我想到西方的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也是要恢复人的个性、理性，其实也都是再寻找人文的尊严。

刘梦溪：您讲的很对，如果作为参证，康德那里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理念。康德说，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。我讲的敬、诚、信，都是绝对价值，具有永恒性，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。不能说到哪个时代，到某一个地方，就不需要敬、诚、信了。你得承认人类社会有公认的基本价值，不能由于讲文化特色，特色到我们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，这将使中国走入死胡同。我在两岸人文对话论坛上的发言是“将无同”，主张人类未来将走向文化融合。人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，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不同的是方式，也就是“化迹”的不同，文化的价值完全可以沟通互阐。我讲的“敬”可以和西方的信仰互阐。我讲“和”的理念，讲张载“哲学四句教”的“仇必和而解”，是希望不同文化在互相阐释中建立彼此的了解，走向化解、和解。“和而解”而不是“斗而亡”，这是我的基本思想。

记者：和您所提及的这些文化大师相比，您所在的现实境遇和他们迥异，支配您重新回到经典，回到源头，回到基本义理，凝炼这些价值理念的动机和他们有什么不同？

刘梦溪：既一样，又有不一样。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，他们的思想源头都离不开“六经”，直到清代还是如此。20世纪大师被称为“三圣”的梁漱溟、马一浮和熊十力，和“六经”是息息相通的，我能够理解并认同他们的观念。

不同的是，我有深切的现实感受，主要是当下的价值流失和价值紊乱。经典的价值流失之后，德范就不存在了。佛教、道教也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人的内在庄严失去了，自性泯灭了，没有敬畏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取，这多危险。还有一点，我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史，知道这个历史流变的过程，痛感晚清到民国以来文化传统的流失与断层，这跟“五四”以来不断反传统、跟传统“彻底决裂”，从激进到激进，不无关系。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开始研究思想学术史，就关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问题。用什么重建？怎样重建？我现在找到了我长期探索追寻的东西了。

记者：您被称为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，但我也注意到，您在很多场合都讲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也很重要，我觉得这并非谦虚，而是您内心的真实认知。

刘梦溪：是这样的。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。文化不决定什么。我不太赞成把国学炒得太热，国学不需要太热。这个世界上有比国学更重要的事情，社会科学不是国学，但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。科学技术不是国学，重要性不必说了。自然科学也不是国学，那是多么重要啊！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国学上去，不一定是好现象。眼光、心胸应该扩大，要看到整个世界。全世界各国的学问都有价值，都很重要，都是那个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结晶，都是我们应该学习、研究甚至参照的对象。所以，国学热有某种风险，如果理解得不好，推扬得不得体，也可以走向自我封闭主义，我们是有前车之鉴的。世界之大，学问必须是开放的，思想也必须是开放的，文化更应该是开放的。

十、为学不专主一家

记者：有了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学术和思想的经验，回过头来您怎样看文学？李泽厚先生近年来提出一个“情本体”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哲学精神，您有怎样的解释？

刘梦溪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在思想学术史里面徜徉时间长了，有所心得以后，觉得文学是历史和哲思的重要补充。文学的根底使我对学术研究更富有想象力，也使我更有还算不错的文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中国学术背景下，文、史是合一的，义理、考据、辞章是学问的互成结构，文学就是辞章，文学也离不开义理。中国古代的文学家，本身就是文史合一的，很少有绝对的单纯的文学家。

李泽厚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他主张“情本体”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主张，而且我的人格现实是和“情本体”合一的。理性的东西不容易给你以幸福感，它使你头脑澄明，但是真正的幸福感在情，烦恼也在情。我是很性情的人（我讲的是底子），个体生命有一种天生的自由感，不喜欢拘束，不执于一端。我推崇“六经”，并不意味着我是儒家的信徒。所有的思想，都是我的资源。老庄的思想也很了不起，我也喜欢，但我不是道家。佛教我更喜欢，每临寺庙，都有大欢喜，但我不是佛教徒，情未了，俗未断。我为学不专主一家，喜欢百家。

相关链接

刘梦溪，1941年生，著名文化、历史学者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、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近年著述有《学术思想与人物》(2004年)、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(2005年)、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(2008年)、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》(2012年)、《陈宝箴和湖南新政》(2012年)等。